

乡村里的都市

——城乡互嵌的战时国都与文学书写

李永东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世界, 二者的区别是系统性的。不过, 战时国都是个例外。全面抗战爆发后, 重庆的战时国都身份来得仓促, 城与人人都没准备好。下江人的不断聚集和疏散, 以及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和乡镇化, 使得重庆成了一座散落的、流动的城市, 包含了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两种样态, 形成了“乡村里的都市”的文化奇观。在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之间, 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 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互嵌入, 下江人频繁穿越于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的越界, 造就了乡村里的都市社会, 造成了城市知识分子的乡村化, 城乡往返的体验影响了重庆叙事的空间构成和观念表达。对于不具有“进入都市的权利”的重庆乡民而言, 他们在自己的家乡遭遇了下江人携带的现代文明, 突然而至又迅速离场的现代生活使他们经受了身份的迷失和心理的失衡。

关键词: 乡村; 都市; 战时国都; 重庆; 城市想象

中图分类号: I20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9)06-0016-06

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世界。城市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土地和自然的依赖, “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 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 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1], 乡村则为与土地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所规约。城市与乡村在景观、人群、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等方面, 都有着天壤之别。张笃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重庆市市长)甚至说: “一个国家内之都市与乡村间的区别, 不亚于国与国间的区别。”^[2]在抗日战争前的中国, 城市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城市的现代转型以背离中国乡村传统作为目标, 使得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北平等现代都市走向了乡村的对立面, 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处于割裂的状态。

都市与乡村的区别是系统性的, 正如凯文·林奇所言: “对任何事物的体验需要与周围环境、前后序列和以往的经验相联系。如果在农田中建一条华盛顿街, 看上去是波士顿的那条商业街, 但事实上却完全是两码事。”^[3]因此, 大都市与乡村小镇之间几乎不会出现越界、混同的现象。不过, 战时国都却是个例外。在战时的重庆, 因人口迁移和战略需要, 横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文化隔离带被人为移除, 都市人与都市事物

散落到重庆周边的乡村, 造成了“乡村里的都市”的文化奇观, 并因此影响了重庆想象与抗战书写的样态。

一、散落、住不定的城市

重庆的战时国都身份, 来得仓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国民政府调动大量军力投入淞沪会战, 鏖战三个月, 上海竟然失守, 危及国都南京, 令当局措手不及, 于是1937年11月20日紧急宣布国府迁渝。伴随国府迁渝, 以及南京、武汉等城市的先后沦陷, 大量流亡者涌进重庆, 仓皇之中与重庆这座城市建立起依存关系。

战乱中, 下江人^①与国都重庆突然发生关联, 双方都没准备好。

就“城”这一方来说, 地处西南一隅的地方城市, 突然升格为战时国都, 一时难以接纳、安顿急剧增加的流亡人口, 其文化观念需要调整, 城市面貌应加以改造, 城市空间亟待拓展。正如张笃伦所言: 国都重庆“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 纯由战争与动荡, 特殊情

收稿日期: 2019-09-20; 修回日期: 2019-10-20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国家文学研究”(SWU1709103)

作者简介: 李永东(1973—), 男, 湖南永兴人, 文学博士,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 联系邮箱: liyongdong2001@sina.com

势所造成，与其它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当时久受封锁，物力维艰”，“兼以需求紧迫，时限仓卒”，“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周安”^[4]。

就“人”这一方来说，流亡重庆的下江人，皆怀着过客、异乡人的心态，根本没打算久居此地。钱歌川的散文《巴山夜雨》表达了下江人不愿淹留重庆的心态：“我既没有讨到一个四川老婆，又无当地的一亲半戚，自然不愿，也不能，在此落业。为着抗战的关系，一时流寓来此，终久是要回到‘脚下’去的。”^{[5](3-4)}在下江人的心中，他们与重庆、与本地人的关系属于临时性质。当钱歌川决定在重庆本地人的土地上建房，以解决住房问题时，他与土地主人都不愿投资过多，“双方都没有想好去做的心情”，结果盖出来的房子，门墙不固，屋顶漏雨，“我自己则年年有离去之意，雅不愿再下资金”^{5}，也就敷衍着过，敷衍着时间，敷衍着自己的重庆生活。司马迁甚至认为，“居留重庆的人压根儿就不欢喜重庆”^[6]。抗战胜利后，下江人纷纷“复员”，甚至像《鼓书艺人》(老舍)中的方宝庆这样的流浪艺人，也毅然离开了重庆。

流亡心态的下江人，主观上不愿淹留重庆；战时重庆的客观现实，也让他们难以安落。国府迁渝，下江人与本地人突然间比邻而居，没有任何前奏和过渡，就以抗战的名义被要求共享同一座城市，而双方在各个方面的接纳、融合，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下江人的重庆生活一直不安定，自1938年年底起，重庆就频繁遭到日机轰炸，躲警报、疏散是重庆生活的常态，轰炸季与雾季的城市季节轮换，让下江人难以在这座城市扎根，难以产生归属感。抗战后期重庆物价飞涨，生存艰难，投机腐化之风盛行，没多少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报纸上却不时有“胜利年”的论调，下江人在期待与失望之间无所适从。

对于下江人而言，战时重庆是一座“住不定”的城市。生活不安定，心也不安定。《委屈》中来自上海的张太太抱怨道：“要是说，非在这里过一辈子不行，那倒也定了心了，可是住又不让住定，天天作回去的打算，可又不知道那一天才能走，这就比什么都难受了。日子又是越来越难过。”^[7]1944年，黄裳在重庆短期逗留，离开前夕也产生了类似的感想：“生活不安定极了。近日来，一直陷入一种迷惑中。好像一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还不知道明天要去的目的地，也许明天一早就要到几万里外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也许不走，还要在这个地方呆下去。这种心情，过去真是不曾经验过的。”^[8]张太太、黄裳的感触，表

明了生活在重庆的下江人，对生活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失去了把控，生命处于悬置和难以规划的状态。重庆的暂时国都身份，拴不住下江人的心，不能让他们产生做重庆人的打算，人与城的关系显得你不情我不愿，战时国都的归化功能也因此逐渐弱化。

重庆之所以成为一座住不定的城市，部分原因在于城区人口的不断汇聚和疏散，以及城市区域的扩大和乡镇化，这使得国都重庆成了一座散落、流动的城市。

国都重庆的体量，应战时需要而迅速膨胀。国府迁来前的重庆算不上一座大城，其城市景观谈不上恢宏富丽，城市人口规模也不大。“七七事变”爆发前，上海有300万人口，南京100万，与之相比，30万人口的重庆只能算个中等城市。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官民荟聚，人口自30万骤增至50余万，几加一倍”^{[9](2)}。1941年重庆市人口接近83万^{[9](9-10)}，1943—1944年为90余万^{[9](25-26)}，1945年超过了100万^{[9](33)}。增加的人口大多为外省人。由于市区过于拥挤与日军频繁空袭，一部分人口被疏散到市郊。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属市后，当局即着手扩大重庆市的范围，到1940年11月重庆市由六区扩充到十七区^[10]，面积也由国府迁来前的近100平方千米，扩展至法定区域300余平方千米，“北达北碚，南至南温泉，东迄大兴场，西达大渡口”，“迁建所及，则约1940(平)方公里”^{[9](146)}。

重庆市面积的大幅扩张，不是城市街道逐渐延伸所致，而是区域划分的结果。因疏散、迁建的需要，重庆城区附近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以及原属四川省管辖的巴县、江北县的一部分，都被划归重庆市。也就是说，重庆市的扩大，把大片乡野村镇直接划进来了，再把市区的人口与机构疏散到了新扩的区域。为躲避日机轰炸，1938—1939年疏散到市郊的人口总数超过41万，1940年和1941年疏散的人口均在20万左右^[11]。这也导致轰炸季与雾季的重庆人口相差悬殊。以1939年和1941年为例，1939年雾季的人口为53万~54万，而轰炸季则锐减至30万以下^{[9](5)}。1941年雾季将结束的4月，照例为重庆市全年人数最多的月份，接近83万，轰炸季来临的5月则陡降至63万，到了七八月则减至43万以下，雾季将来的9月又陡增至68.8万人^{[9](9-10)}。雾季一来，许多疏散的人口涌进市区，这是因为流亡重庆的难民“已财尽力竭，迫离市区即无家可归，政府救济，属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市民寄居市内尚可免维生活，离开市区即失其凭依”。^[11]

轰炸季与雾季的交替，造成了重庆市民的生活空

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转换。《公务员日记》一文写到轰炸季与雾季交替的重庆生活：公务员一家，在轰炸季，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乡下，做公务员的丈夫在重庆城里上班，并住在城里，只在假日回到乡下与妻儿团聚；到了雾季，一家人全部住在城里。“空袭季节的城乡二份家的开支，以及假日的奔波探亲”，苦坏了做丈夫的公务员^[12]。这种季节性的转换，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家庭的住行开支，也造成了战时国都经济生产、商业消费和娱乐的间歇性和节奏感，例如：戏剧界借助雾季的屏障，每年举行雾季公演。两个季节的区分，甚至造成了大后方文学的转型^[13]。

人口的汇聚与疏散，疏散区与迁建区的规划，使得战时国都成了一座散落、流动的城市，也使得战时国都实际上存在着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两种形态。

二、城乡互嵌的战时国都

在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互嵌入，下江人频繁穿越于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城市重庆和乡村重庆的越界，对城市文化和文学书写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一，造就了乡村里的都市社会。城市重庆通过下江人和机关工厂的疏散，把触角伸到了乡村，把上海、南京等东部地区的城市文明嵌入到乡村世界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乡村里的都市社会。

城市特有的文化元素散落到重庆周边，点缀、穿插在乡村空间中。在重庆的郊区乡野，不难看到大都市才会有的物质奇观和人群构成。巴金的小说《还魂草》描写了位于重庆郊区山谷中的一个小镇，这里有银行、百货公司、面包店、书店、茶楼、饭店，“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带着那些绚烂的红绿颜色”，“展览着各种各类的上海奢侈品”，街上走过一对对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以及大学教授、中学教员、银行职员和公务员^[14]，每天有二三十趟公共汽车往返于小镇与城里。在重庆，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嵌入是以拼贴、杂凑的方式进行的。“自民二十七以来，成渝两地，旅人麇集，两大城不能容，则散之附近小县，县城不能容，又更散之乡村。宾主杂处，言习渐通。试于重庆顺公路西行，时可于田野山谷间，见摩登少妇，偕短装男子同行，闻其言，则南自江浙，北及幽燕，各音皆有”^[15]。在重庆郊外，“只要留心一看，许多茅棚草屋门前，时常有雪白的西装衬衫、摩登旗袍之类晾晒出来，这种不调和的色彩，反映着重庆住的写真”^[16]。这是城市人与乡村环境的奇特结合，结合后的文化空

间在性质上既非纯粹的乡村，也非通常的城郊，更非城市，而是城市与乡村的拼贴和叠加。在疏建区和迁建区，沿海的都市文明生硬地嵌入重庆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反差、失真的视觉效应。张恨水《傲霜花》第七章对重庆市郊区曹晦厂教授所住“村子”进行了描写：“小山谷里，三幢一堆，五幢一群的草顶房子，拖长着在这山谷里安排了。这房子虽然都是草顶的，然而它们的样式，都是中西合参的。每幢房子面前，总有一块小平地。那里栽两三丛花，或者栽两三棵树，总有一些风景的点缀。这是守旧的农家所不肯干的，所以远远的看了去，就知道这里是一所假村子了。”这种房子，非中非西、亦中亦西、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即为战时重庆的城乡杂凑景观。

散落在重庆周边乡村的都市元素，是随下江人的疏散而来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量下江人内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这些下江人“大都来自通都大邑，曾享受过相当舒适的生活”^[17]。1939年始，内迁到国都重庆的下江人以及机关、学校，又因躲避日军的大轰炸，分散到周边的疏建区。由此，城市特有的文化元素，包括人群、器物、景观、语言、生活方式等，散落到周边，点缀、穿插在乡村空间中。

通常来说，乡民是为都市社会、都市文明所排斥的一类人，不具有“进入都市的权利”^[18]。但是，疏散到重庆郊区与乡村的下江人，本身拥有“进入都市的权利”，而且，疏建区的水陆交通网络，也为他们进入重庆城提供了便利。这就意味着，疏建区的乡镇空间容纳了两类人——被都市排斥的人与拥有“进入都市的权利”的人，这就造成了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外省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的越界和对话。

国都重庆在空间上化整为零，把触角延伸到市郊乡野，既带来“文化疏散”（文化机关、文化物质的疏散）^[19]，也带来乡镇社会和权力关系的调整。老舍在小说《民主世界》（1945）中，以讽刺的笔调，书写了重庆郊外一个小小乡镇的空间膨胀与文化畸变：

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它的邮政代办所已改了邮局，它的小土地祠已变为中学校，它的担担面与抄手摊子已改为锅勺乱响的饭馆儿，它有了新的街道与新的篾片涂泥的洋楼。它的老树上已有了栖鸦。它的住户已多数的不再头缠白布，赤脚穿草鞋，而换上了呢帽与皮鞋，因为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监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20]

城市化的过程是空间的再生产过程，上海、香港

的文化跨越时空降临偏僻小镇金光镇，带来了街道、服饰和消费的改变。然而，重庆郊区乡镇的城市化不是经由“自然”过程而形成的，而是下江人与城市文明突然闯入乡村的结果，它造成的观念现实不一定健康。在老舍看来，随下江人而来的都市文明，主要不是作为启蒙观念照进金光镇的传统社会，而是与封建特权思想握手言欢、沆瀣一气，“平等”“民主”“法制”等现代观念都成了获得特权的依据，对乡村社会和平民百姓进行宰制，造成了金光镇貌似新奇、实则陈腐的文化风气。这是高层的权势人物(中央机关委员)、最现代的观念(上海、香港的都市观念)落到僻陋乡镇的尘埃里，生出的畸形的国都郊区的文化现象。

其二，造成了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乡村化。一方面，散落乡村的公教人员，虽然处于村居状态，但他们的生活内容、精神情趣、主导倾向仍然是都市的、现代的，这让本地人感到讶异，感叹“这就是下江人哪”^[21]。另一方面，在生活的压迫下，曾经从乡土走向都市的知识分子，程度不一地重返农民的生存方式，被再次乡村化，关心粮食和蔬菜。吴组缃养着一口小花猪(老舍《吴组缃先生的猪》)，丰子恺的村居岁月有一只高傲的鹅相伴(丰子恺《沙坪小屋的鹅》)，住在南温泉的教授们自己种菜(张恨水《巴山夜雨》)。抗战后期，许多作家在疏建区过着乡居生活，如茅盾、老舍、张恨水分别住在离市区几十里的唐家沱、北碚、南温泉。他们置身乡镇之中，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喧嚣，少了都市声光化电的刺激，生活节奏变得缓慢，其创作内容因此更多涉及饮食起居、家庭日常、乡野风光和晨昏心境。战前他们生活上海、南京、北平等都市，属于都市知识分子，习惯了都市生活。性情闲淡如丰子恺，亦认为闲居生活的幸福感“必需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而住在重庆郊外荒村里，让他备感岑寂、苦闷^[22]。村居的状态，让知识分子远离了国都重庆的权力中心，产生了一种边缘的心态。张恨水《傲霜花》中居住在乡间的教授们，在身份上把自己与重庆“城里”的人区别开来，认为在城里住的都是有办法、时尚的人物，乡居则意味着迂腐、落伍、失意。疏建区各类人群混杂的社会结构和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位置，让现代作家真正从象牙塔走进了民间社会，对战时社会的众生相进行近距离的打量 and 书写。

其三，城乡往返的体验影响了重庆叙事的空间构成和观念表达。下江人移住的郊区乡野，并不是闭塞的乡村空间，而是与重庆城区频繁沟通的乡镇。重庆疏建区沿成渝、川黔公路两侧进行规划，以便于与城区的交通往来。身处市郊乡野、被都市生活培养起来的公教人员，他们具有“进入都市的权利”，不断在

城区与乡间之间往返。城乡频繁跨界的日常生活重塑了他们的文化经验和社会体认。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位于离重庆城区三十里的沙坪坝，上海的复旦大学迁至北碚东阳镇。中央大学的部分教授住在城里^{[23](172)}，学生在周末也争相挤校车去城里“找朋友，买东西，是最普遍的事”^{[23](169)}。城乡往返的生活状态，影响了作家的重庆想象。茅盾的《船上》《一个够程度的人》这两篇小说都选择通过城乡间流动的空间——“轮船”来速写重庆社会的面影。在老舍《鼓书艺人》和茅盾《腐蚀》中，城区与郊区的空间变换，决定了情节的起承转合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焦菊隐《重庆小夜曲》通过回忆，使叙事空间在江边小镇与重庆城之间不断切换，而空间的切换带来了小说的情绪基调的参差和起伏。小说把浪漫的爱情安排在夏季的江边小镇，孟何之与几个女学生在小镇的山坡上建造理想的花园。当孟何之与落莎先后离开小镇来到重庆城后，在晦暗的天气和阴郁的氛围下，他们的爱情故事朝着悲剧的方向转变。张恨水《傲霜花》的叙事空间在城区与疏建区的乡间来回穿梭，既构造了文化生活的贫富对照、城乡对照、生活状态对照，又为人物关系、人性异化、情节发展的腾挪变异提供了方便。总体来看，文学中的战时重庆故事，在叙事空间上，喜欢在疏建区与城区之间腾挪变换，空间对照是常常用到的手法，战时的漂泊、生存的艰难、社会的不公等思想情感，由此得以抒写。

三、在乡村遇见城市文明：身份效仿中的自我迷失

关于城乡互动关系中的重庆书写，几乎都是立足于下江人的视角。实际上，城市嵌入乡村，也给本地乡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只是少有作家从本地人的视角进行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短篇小说《山下》(1939)是一篇值得重视的作品。

下江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性，是由都市生活、现代文明熏染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也与现代都市相切合。下江人疏散到乡村重庆，带有“文化闯入”的性质，惊扰了《山下》中的东阳镇百姓的惯有生活。下江人所携带的文化在时间、空间性质上迥异于东阳镇。他们进入东阳镇的方式就让本地民众惊诧：携带着大小行李乘坐花花绿绿的大汽船汹涌而来，乡民争相看稀奇，甚至腿脚不方便的妈妈也一次次“一拐一拐的往江边上跑。跑着去看那听说是完全载着下江人的汽船”^[21]。下江人从重庆城区出发，以“现代”的方式进入嘉陵江边的小乡镇。他

们的衣着打扮、日常消费、生活方式无不带有现代、都市、下江的色彩,让东阳镇的乡民大开眼界。林姑娘和乡亲们依据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想,交流着关于下江人的“传说”:“传说那下江人(四川以东的,他们皆谓之下江)和他们不同,吃得好,穿得好,钱多得很。……又听说下江人到那里,先把房子刷上石灰,黑洞洞的屋子,他们说他们一天也不能住,若是有用人,无缘无故的,就赏钱,三角五角的,一块八角的,都不算什么。”^[21]林姑娘从下江人家里带来的“没吃过”的“繁华”饭菜,更是印证了乡间关于下江人的“传说”,他们感叹:“下江人,这就是下江人哪!”

下江人与重庆乡民的文化身份存在明显的区隔和落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下江人与东阳镇的乡民在文化身份上不同类,却不得不聚集。《山下》以林姑娘进入下江人的世界来生发故事。林姑娘因在下江人家里做佣人,她的身份、地位、生命状态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境地。实际上,林姑娘不自觉中朝着下江人和城市人的方向转变,建构自己的新身份:一个月四块钱的工薪,与主人一家吃一样的饭菜(剩下的),像下江人一样用白洋碱洗衣服,慢慢会讲下江话了。林姑娘在下江人家里做点杂务,她在当地人眼中就逐渐接近了下江人和城里人的身份和地位。她在家里和邻里获得了与十一岁小姑娘不相称的尊重,被当作所有孩子中的“模范”,她多少有些骄傲、自重,在家里敢于自己拿主意了。她的新身份和地位源自傍附、模仿下江人。她受到母亲和邻里的尊重和羡慕,恰恰因为她逐渐变得不像当地人,而像流亡重庆的下江人。一旦她被辞退,没有了一个月四块钱的佣金做底子,她就被打回了原形。曾经短暂拥有过的幸福、享乐和富裕,包括众人的尊重,随之结束。身份的跌落让林姑娘感到羞耻,但她已回不到当初“安闲、平静、简单”的生活,在心理上无法回到之前的生活轨道上,她只有沉默、枯萎。对于林姑娘而言,突然而至又迅速离场的“现代”生活,留下的是异化后的心灵创伤。下江人带给重庆乡镇的现代面相和物质奇观,对于普通乡民而言,仅仅是展示,是诱惑,是惊扰,而不能成为他们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因此,他们与下江人、现代文明的接触经验,往往导致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的失衡。

通常情形下,城市人和乡村人之间存在无形的高墙,“乡村的铁匠和城里的铁匠,乡村的村长和城里的市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乡土的人和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他们感到了不同,其次,他们被这种不同所支配,最后,他们相互之间一点也不了解”^[24]。当一定规模的城市人群被抛入乡村世界

时,就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越界,以及城市人与乡村人的近距离接触和经验交换。由城市而来的下江人只是把现代文明、城市经验支离破碎、浮光掠影地呈现在重庆乡下人面前,重庆乡下人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进入都市的权利”,城乡互嵌的特殊社会也未为乡下人转变为城市人提供系统的条件,因而他们想通过模仿下江人来建构自己的城市人、现代人身份,就显得不切实际,被乡土培养起来的灵魂走向了变异。

下江人闯入乡村重庆,制造了类似于两种人群、两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对于卷入“接触地带”的双方来说,意味着“与自我的社会的疏离,以及与他者的社会的疏离”^[25]。作家在书写下江人时,喜欢让下江人通过回忆,不断回味过去城市的生活,保持身份的连续性和自足感,如张恨水《巴山夜雨》中的奚太太、李南泉,老舍《面子问题》中的佟景铭。散落、流动的重庆,让下江人与本地人突然遭遇,走向对方,相互接近又相互误解。下江人所处的城乡叠加的地带,让他们对城市重庆与乡村重庆皆持疏离的态度,难以对重庆产生民族国家之外的地域认同感。

总之,散落的城市场空间、城乡混杂的文化状况、城乡交替的空间叙事,构成了战时国都的侧影,影响了抗战文学的风貌。

注释:

- ① “下江人”是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长江流域各省的“下江人”概念在范围上有所不同,重庆人所使用的“下江”一词泛指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下江人”则是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人的指称,甚至被用来泛称西南大后方以外其他省的人。张恨水解释道:“四川则谓客籍者为下江人。其人苟不能操西方官话(川滇黔),虽来自甘青,亦在下江之列。”(张恨水. 重庆旅感录. 旅行杂志, 1939(1): 49-52.)

参考文献:

- [1]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154-155.
- [2] 张笃伦. 漫谈市政建设[J]. 市政评论, 1948(3): 2-3.
- [3] 凯文·林奇. 城市的印象[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1.
- [4] 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516.
- [5] 味橄. 巴山随笔[M]. 重庆: 中华书局, 1944: 3-4, 5.
- [6] 司马迁. 重庆客[M]. 重庆: 万象周刊社, 1944: 181.
- [7] 茅盾. 委屈[M]. 重庆: 建国书店, 1945: 14.
- [8] 黄裳. 锦帆集[M]. 上海: 中华书局, 1946: 71.
- [9] 重庆市档案馆, 重庆师范大学.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

- 社会[C].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
- [10] 潘洵, 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338.
- [11] 潘洵. 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 274.
- [12] 彭子冈. 子冈作品选[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131.
- [13] 段从学. 夏季大轰炸与大后方文学转型——从抗战文学史的分期说起[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7): 1-16.
- [14] 巴金. 还魂草[M]. 重庆: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2: 18-19.
- [15] 张恨水. 重庆旅感录续编[J]. 旅行杂志, 1940(1): 31-33.
- [16] 思红. 重庆生活片段[J]. 旅行杂志, 1940(4): 7-10.
- [17] 吴大业. 物价继涨的经济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6: 9.
- [18] 亨利·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7.
- [19] 柳湜. 论文化疏散[J]. 全民抗战, 1939(72): 1030-1031.
- [20] 老舍. 老舍全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431.
- [21] 萧红. 山下[J]. 理论与现实, 1940(4): 125-137.
- [22] 丰陈宝, 丰一吟. 丰子恺散文全编: 下[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165.
- [23] 袁佳红, 王志昆, 曾妍.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文化[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69, 172.
- [24]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第二卷[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80.
- [25] 罗钢, 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89-90.

The city in the country: The wartime capital and literary portrait with a fusion of city and country

LI Yongd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ity and country are two separate world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systematic. But wartime capital is an exception. Chongqing's status as a wartime capital was established abruptly, and both of the city and its people were not ready. Due to the continuous gathering and evacuation of people who lived downstream,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urban areas and villagization, Chongqing became a scattered and mobile city, including two forms of urban Chongqing and rural Chongqing, which formed a cultural wonder of "city in the countryside". There is a special for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ongqing. Urban civilization and rural civilization are embedded in each other, and urban life and rural life frequently cross. The transgression between urban Chongqing and rural Chongqing has brought up the urban society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aused the ruralization of urban intellectuals. For Chongqing villagers who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enter the city", they encounter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carried by people who live downstream in their hometown, and the modern life of sudden arrival and rapid departure makes them suffer from the loss of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Key Words: country; city; wartime capital; Chongqing; city image

[编辑: 谭晓萍]